

往事回眸

这是一支从未打过败仗的部队,也是我军战史上唯一一支从祖国版图的最东头打到最西头的部队。60年过去了,如今他们仍在新疆屯垦戍边——

# 征战西北的山东兵

□ 杨书强

在美丽的天山南麓,是素有“华夏第一州”之称的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在该州4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二师承担着屯垦戍边的神圣职责。该师的前身,是由万名德州子弟为骨干组成的山东渤海军区教导旅。当年,为解放全中国,他们横刀立马,披荆斩棘,血染沙场,一路西进,千里跃进路遍祁连山脉,万里艰辛跨越戈壁瀚海……

## 万里西征

1947年10月5日,渤海军区教导旅经过半年紧张训练后,从德州庆云县出发,11月末抵达河北省武安县。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渤海军区教导旅在这里由华东军区移交给西北野战军,代表西北野战军前来接收的正是二纵司令员兼政委王震。交接会上,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山东自古多好汉,而今好汉就更多,你们便是山东的好汉。今天我把你们交给王震将军,由他率领你们到西北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全旅指战员以震撼山岳的掌声、欢呼声,接受了这一光荣使命。

部队移交后,渤海军区教导旅改番号为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独立六旅,下辖的一二三分团分别改称为16、17、18团。从此,山东子弟兵开始了万里西征。他们在王震将军指挥下,飞越太行,强渡黄河……一路解放了16座城市,歼敌2.78万人。

在西府陇东战役中,胡宗南遣调36军和136旅企图攻占荔镇,完成对西北野战军总部的合围。当时独立六旅18团位于荔镇,旅长张仲瀚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坚守。那场恶战,独立六旅以两个团的兵力抗击一个军加一个旅。18团团长沙牲了,团里有五个连队100多人,最后只剩下18个人,但部队硬是没有后退一步。彭德怀通过荔镇撤退时,跳下马对张仲瀚说:“你们阻击得好,要给18团的每位同志记一大功!”又说:“六旅是支好部队,将来要多出干部!”

这支部队后来确实出了不少干部。据不完全统计,原渤海军区教导旅的干部战士中,提升为省部(军)级的有35人,提升为师(厅)级的有100多人。当时,在西北籍官兵占大多数的西北野战军,独立六旅的山东兵常常让各级首长刮目相看,王震的警卫员大部分都是从独立六旅挑的。而这份信任和荣誉,都是战士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万名山东健儿西征,有半数牺牲在了途中。宁津县柴胡店镇村庄村参军的38人,只有7人活着到了新疆。

在宁津籍战士刘双全的记忆中,1948年冬陕西省蒲城县的永丰镇攻坚战也是比较激烈的。永丰镇寨墙坚固,外有开阔地和壕沟,镇内明确碉堡星罗棋布。全旅集中6门山炮在北寨墙打开缺口,战士们想在此处冲进镇内,但遭战火



部队开进新疆

力网扫射,伤亡很大。危急时刻,17团团长沙金忠藩抄起一根扁担,高声大喊:“共产党员跟我上!”在他的带领下,战士们一鼓作气冲了进去。这次战役中,独立六旅俘虏敌人2064人,但也付出了505名指战员伤亡的重大代价。刘双全所在的连牺牲了13人,其中包括他表弟。现在永丰镇有一座烈士陵园,墓碑上凡是刻着“籍贯山东”的,都是独立六旅的人。而牺牲在西征路上的绝大多数烈士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战死沙场的近5000山东兵,如今在档案中能够找到姓名的,仅有951人。流血牺牲没能吓倒这支山东部队,他们冒着反动派的枪林弹雨,一路血战,驰骋沙场,捷报频传,直抵新疆。

1949年2月,中央军委对人民解放军实行统一编制,独立六旅改名一野一兵团二军步兵六师。同年9月,部队经过万里征战,抵达新疆焉耆、库尔勒、轮台、尉犁等地,胜利完成了解放新疆中南部的任务,揭开了屯垦戍边的新篇章。

## 屯垦戍边

初到焉耆时,屯垦条件极为艰苦。当时,满眼是戈壁荒漠,几十公里内难觅人踪,而所存粮食仅够吃13天。军粮告急!生存告急!要想长期扎根,只能靠自力更生。部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放下枪炮,拿起锄头,立即投入大生产运动。曾任三五九旅719团团长,时任六师师长的张仲瀚,发扬三五九旅精神,带头背着筐子外出拾粪,一时成为老百姓争相传颂的特大新闻:“各族人民的救星来了!”

没房子住,战士们砍下柳树桩搭个架子,割下芨芨草往架子上铺就成了草棚子。后来,发明了地窝子。就是在地面上挖个大坑,上面架个顶。下雨时,外面大下,里面小下。粮食供应困难,断粮的事情时有发生,青菜几乎吃不上,不

少战士都得了夜盲症。冬天发一身棉衣,到了春天战士把棉花掏掉,变成了夹衣。很多战士到最后都把棉裤穿成了褙裤。夏天战士们都光着膀子。没有牛马,官兵们把绳子往肩上一套,用人拉犁,肩膀磨出的血把绳子都染红了。官兵们天一亮就下地,一直干到新疆时间晚上12点,从不休息。有的连队仅有的几头牛累坏了,烧尾巴牛都不起来。老战士们提起这段时期都说太累、太苦了,但他们都坚持下来了,没有一个人当逃兵。当时王震将军说:“咱们这些人谁也不要走,我就是死了,骨灰也要撒在新疆!”而且说到做到,去逝后真的把骨灰撒在了天山。对老将军这一道不是命令的命令,战士们忠诚地执行了半个多世纪,而且传之后人,一代一代继续执行。这是因为屯垦戍边的使命永远延续,也因为这群山东兵的名字就叫忠诚!

屯垦初期,在焉耆一片不知名的茫茫荒原上,几位军官用望远镜远眺,方圆几十里看不到烟。走着走着,突然发现杂树丛中有半间土房子,一位维吾尔中年男子见了军人惊慌失措。大家连忙安慰他别怕,并亲切地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回答说叫“肉孜和田”,以砍柴牧羊为生。于是,他的名字成了这里的地名。后人传颂的著名的“开都河畔第一犁”就在这里:扶犁的是三五九旅老干部,时任十七团政委的谢高忠,拉犁的是教导旅战士杨生杰等三位小伙子。另一处屯垦地方为“乌瓦”,维吾尔语意为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土地严重盐碱化,“无风一片白,有风白满天”。在这种极端条件下,教导旅的战士们摸索出了“种稻洗盐、水旱轮作”的方法,创造了单产986斤的全新疆最高纪录。

## 扎根边疆

1970年“文革”中,老战士刘双全被从牛

棚解放出来到29团当团长。他大刀阔斧地推行水、田、林、路综合治理,把当时全团230块大条田,改成了960块小条田,使排灌更顺畅,土地更平整。他在全兵团率先推广飞机播种水稻和化学除草,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刘双全走上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的岗位,成为渤海军区教导旅的又一骄傲。

如今60年过去了,山东兵们不但没有回老家,反而把家安在了新疆。他们把当初的不毛之地建成了繁华都市,现在这里拥有21万人口,焉耆、库尔勒、塔里木、且若四大垦区,12个现代化农场和30多个企事业单位,全师拥有国土面积73.97万公顷,其中农区56.11万公顷、山区17.86万公顷。今天的库尔勒垦区,被誉为“孔雀河畔的璀璨明珠”,香梨、棉花、鹿茸、啤酒花、西红柿酱等,闻名遐迩,畅销国内外市场。人们进入新兴的石油工业城市库尔勒市,首先看到的是“十八团渠纪念碑”雕塑:一位战士身披硝烟,英姿雄壮,背着坎土镩走来。这是千百个从山东走来的渤海军区教导旅战士的精神写照,是千百个长眠于大漠荒原的拓荒者永远耸立的身影。步兵六师后来改番号为新疆建设兵团农二师,现任师团首长都是这些山东老战士的后代,他们大部分都知道自己的祖籍是德州,他们在继续着父辈的事业——一手拿镐,一手拿枪,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成了渤海军区教导旅的真实写照。

“生在井冈山,长在南泥湾,转战三千里,屯垦在天山。”这是王震将军给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老战士的题词。原渤海军区教导旅旅长、长期主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领导工作的张仲瀚,也在《老兵歌》中充满激情地写道:“兵出南泥湾,威武不可挡;身经千百战,高歌进新疆。兵团多健儿,未离手中枪;边关烽烟起,重新上战场!”

·相关链接·

## 渤海建军

□ 杨书强

据《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团战史》记载,渤海军区教导旅的源头是1930年10月诞生的红军湘东独立第一师,王震任政委,后扩编为红军第六军团,抗战爆发后改编为三五九旅,王震任旅长兼政委。1944年初冬,为深入敌后开辟华南抗日根据地,王震率三五九旅南下,经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直到广东,在敌后孤军奋战近两年,行程二万七千余里,于1946年9月回到延安。毛主席高度评价三五九旅“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流血牺牲的崇高革命精神,称南下北返是我军历史上的“第二次长征”。此时,部队由出发时的5000多人减员至1863人,急需扩充兵力。

中央决定,由时任党中央书记处五书记之一的任弼时亲自组织领导三五九旅的扩军工作。任弼时认为陕北地狭人稀,已经为粮食、兵员补充作出了重大贡献,应该着眼长远,到人民稠密、物产丰富的解放区如华东解放区的渤海区招军。

渤海区成立于1944年1月,由冀鲁边军区与清河军区合并成立,所辖区域涉及现在山东的济南、德州、淄博、潍坊、东营、滨州等六市和河北省沧州市及天津市下辖的共51个县、区,渤海区党政军领导机关驻今惠民县城区及惠民县何坊乡。1950年5月渤海区撤销。

1947年初,招工工作在当时属渤海区的振华(现宁津)、阳信、商河、惠民等县展开。中共华东前委对组建新军十分重视,前委书记、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要求地方政府和所属部队全力支持,并委派张爱萍将军组成“渤海军区招兵指挥部”,具体负责协助招工工作,使招工工作进展十分顺利。曾任渤海教导旅副政委的熊昆将军(离休前任新疆军区副政委)回忆说:“1947年春节刚过,各区、县就把参军青年集中编队后,送到了我们所在的阳信县。我们招兵工作队成了接兵工作队,这是历来扩军没有过的事。”

原来,当时的渤海区已经开展了土地革命,广大翻身农民分得土地,革命热情很高,一听参军是为了“打倒蒋介石,保卫胜利果实”,都争先恐后地报名。新疆建设兵团原司令员刘双全就是这时参军的,他是宁津县城关镇东关村人。据他回忆,当时人们的普遍认识是:参军光荣,不当兵是秀才!不积极参军的找媳妇都困难,当地掀起了“父母送儿打老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热潮,很快就组建了一支1.1万人的部队,其中宁津人占了三分之二,有的一个村就参军三四十人。解放后曾任新疆和硕县县长的刘华顺更是兄弟3人同一天入伍。

1947年2月23日,建军典礼在阳信县老鸪王村举行,党中央、中央军委正式命名该部队为山东渤海军区教导旅,简称渤海教导旅,并任命了旅、团两级领导干部:旅长张仲瀚(后任国家农垦部副部长)、政委曾涤(后任中组部副部长)、副旅长贺盛桂,副政委熊昆、参谋长刘鹏、政治部主任叶显藩;一团团长刘克明、政委阎化一,二团团长金忠藩、政委肖友明,三团团长陈实、政委于侠。

这次建军成了我军建军史上的一个范例——短短两个月时间,就在一个地区组建了一支万余人的正规军

20世纪初,沉睡了2000多年的敦煌汉简重见天日,它给中国书法界带来了怎样的震动?汉简书法完成了对中国古文字的改造,开启了后世的草、行、楷书,一直影响到了20世纪以来的中国书法创作。

## 2003年8月3日晚,北京天坛成了全球瞩目的焦点。

千呼万唤中,2008年北京第29届奥运会会徽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中国印·舞动的北京”惊艳登场,刹那间征服了全世界的目光。北京奥运会会徽图案高度融合了中国特色篆刻艺术和现代体育运动特征,古朴稚拙而又动感十足,极富现代气息。特别是英文“BEIJING”和阿拉伯数字“2008”出人意料地用敦煌汉简书法的形式写成,堪称神来之笔。

这大概是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第一次变成中国风格的书法字,而敦煌汉简书法那种古朴、率真、洒脱的特点,不仅与人类的伟大梦想——奥林匹克运动合拍,而且和中国印一脉相承,浑然一体。

## 1907年,当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敦煌玉门关附近刚刚发掘出写有汉字的木简时,怎么也没想到,他的举动在中国文化界会引起如此强烈而又持久的反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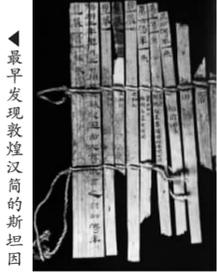
在流沙中掩埋了2000多年的敦煌汉简重见天日,立刻受到国际汉学界的高度关注。斯坦因无意中打开了一座罕见的汉代书法宝库,那里面珍藏着中华先民最早的书法墨迹。首批789枚敦煌汉简被斯坦因运回英国后,法国汉学家沙腕博士很快将这批新出土的汉简编辑出版。

我国文物收藏家罗振玉知道了这批资料在沙腕博士手上的时候,就写信给他,希望对方能够把这些图版资料提供给他,做些研究,后来沙腕博士就把这批资料寄给他了。罗振玉如获至宝,他与国学大师王国维分头整理考释,1914年,两人合著的三卷本《流沙坠简》由日本京都出版社出版。

《流沙坠简》对所收录的敦煌汉简和残纸、帛书都做了精确的分类和详尽的考释,被视为首次全面解读汉简的开山之作。连一贯反对“整理国故”的鲁迅先生看了王国维《流沙坠简》序言后都赞叹不已,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国学。汉简的出土在中国书法界引发的震动更为强烈。著名书法家刘正成先生甚至用“原子弹爆炸”来形容这种震动。

当时的中国书法界正在寻求行草书的大变革,但苦于找不到传统的借鉴。行草书的源头在汉代,而当时人们看到的汉代书法都是碑刻,没有手写的真迹。

在敦煌汉简出现之前,许多名家都曾怀疑过王羲之传世书法《兰亭序》的真假。因为汉魏六朝



最早发现敦煌汉简的斯坦因

时期留下来的碑刻书法与王羲之的书风差距太大。而在敦煌汉简墨迹中,王羲之书法已初露端倪。斯坦因之后,敦煌地区汉简的发掘进入了高峰期,数以万计的汉简大量出土,令人目不暇接:1930年,瑞典人贝格曼在居延地区发掘出大批汉简,总数多达11000多枚,史称“居延汉简”;1957年至1959年,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相继出土汉简书精品《玉杖十简》和《礼仪简》;1973年至1974年,甘肃考古工作者在居延甲渠侯官、金塔县肩水金关等遗址出土汉简2万余枚,又称“居延新简”;1979年,敦煌玉门关西的马圈湾又发现了斯坦因当年遗漏的烽燧,出土汉简1217枚;1987年,敦煌市博物馆发现了汉代敦煌郡效谷县悬泉置遗址,发掘汉代简牍27000多枚;到目前为止,在甘肃发掘的秦汉简牍数量已达65000多枚,占全国出土简牍总量的5/6。敦煌和居延简牍、殷墟甲骨文、敦煌藏经洞文书、故宫明清档案,被学术界称为20世纪中国四大考古发现。

掩埋在漫漫沙漠中的木简,历经2000年而不朽,得益于当地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敦煌地区平均年降雨量只有39毫米,而蒸发量却接近3000毫米!干旱少雨的敦煌大地,无意中成全了数以万计的汉代书法原作。

## 这些貌不惊人的木简究竟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密码?它为什么100多年魅力不减,让几代考古学家、书法家们为之心醉神迷呢?

2009年秋天,敦煌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再次来到被斯坦因遗漏的马圈湾遗址,想看看斯坦因究竟遗漏了什么。敦煌博物馆馆长付立诚介绍这个马圈湾遗址

是在1907年斯坦因在中亚考古调查中间被遗漏的,1979年的文物普查发现了这个遗址。在上世纪80年代,甘肃省考古研究所对这个遗址进行了发掘考古,考古中间共发现汉简1200多枚。这个遗址在当时规模比较大,有可能是玉门侯、玉门侯官住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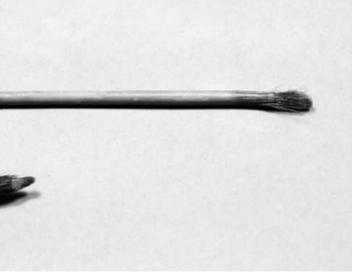
西汉时期,为了打通西域,清除匈奴边患,汉武帝先后三次对匈奴发动了大规模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为了经营河西,维护丝绸之路交通线,汉武帝在元狩二年(前121年)置武威和酒泉两郡,元鼎六年(前111年)又分置张掖和敦煌两郡,并设立了中国最早的海关——阳关、玉门关,史称“列四郡,据两关”。

汉朝在屯兵戍边的过程中,沿汉长城线建立了大大小小的关塞亭障和烽燧,形成一条绵延万里的侯望系统。《汉书·赵充国传》描述: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障有吏卒数千人。汉简就是这一历史时期的遗物,它们的绝大多数出自烽燧亭障。

现知纪年最早的汉简是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最近的纪年简,为前凉时期建兴十八年(公元341年),前后延续了400余年。简牍主要内容有诏书律令、司法文书、例行公文及吏卒名籍,出入关登记等各类簿籍,还有买卖契约、往来书信等。事无巨细,包罗万象。是汉代边塞政治、军事和日常生活的真实记录。

河西地区长城沿线的汉简大部分是就地取材,以胡杨木、红柳、白柳木居多。单行文字的叫简,多行文字叫牍,多枚汉简用麻绳串起来叫册,还有一种削成三棱、四棱或八棱的叫做。觚是练习写字用的。

敦煌汉简的发掘似乎永远不可能穷尽。最近的一次重要发掘是在2009年3月,敦煌市博物馆在马圈湾以南的湾窑墩烽燧,发掘出一枚迄今为止尺寸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汉代封检。



敦煌出土的汉代毛笔

# 流沙坠简

这支封检上的书法墨迹如新,字体已经接近楷书了。

纸寿千年。历代书法家莫不渴望直接看到古人的真迹,以领略其笔墨神韵。而唐代以后,连王羲之的书法真迹都已消失殆尽,何况更早的汉代遗墨。

北宋大书法家米芾有幸看到过当时发现的汉代简牍,他大为震惊,认为“河间简牍乃书法之祖”。但限于当时的保存条件,这些简牍没有被更多的人看到。后人只能通过摩崖石刻和拓本、法帖来学习古代经典。在将近2000年的时间,人们不知道汉代人是怎样写字的。专家们也只能根据汉末的山东碑刻,比如《史晨碑》、《乙瑛碑》、《张迁碑》等,去揣摩汉代人怎么写字。

敦煌汉简的大量出土,加上现代文物保护技术的进步,照相印刷技术的发明,书法家们随时随处零距离面对古代墨迹的千年梦想终于成现实。穿越时空的隧道,拂去岁月的尘沙,汉代书法的全部秘密密露无遗,长期困扰中国书法的众多谜团终于真相大白。

## 那么,两汉时期的人们究竟是如何学习书法的?为什么数千万汉简的书法都达到了令后世仰之弥高的艺术水准?这些不留名的书法家们为什么能够完成中国书法史上最伟大的变革?

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内容是汉代识字、练习的教科书《苍颉篇》的第一章,是当时在这烽燧上戍守的书左临摹书写的。

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汉代对书法教育的高度重视。而数量如此众多的书法家群体的出现,则得益于汉朝以书取仕的文官制度。

西汉政权建立后,丞相萧何制定汉律九章,其中《尉律》规定“学僮十七以始试,识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书或不正,辄笞劾之。”

这就是说,字写得不好,甚至会丢了官帽。这些汉简行笔婉转自如,流畅奔放,起笔干净利落,收笔果断遒劲,布白大起大落,疏密对比强烈。显然,书写者具备了高超的书写技巧和把握节奏、韵律的能力。

汉简的时代,包括秦代到东汉末期,大约400年时间,这正好是中国古文字向今文字转变的时期,也是中国书法史上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在学术上叫“隶变”,就是汉字字体由篆书逐渐演变到隶书。敦煌汉简的出土,把隶书的成熟期由过去人们公认的东汉晚期提前到了西汉中期,从中看出古隶向汉隶转化的剧变和成熟过程。

在中国文字剧烈变化的汉代,汉简书风上启下,完成了对中国古文字的改造,开启了后世的草、行、楷书。

东汉学者赵壹在《非草书》中说,秦末至汉初,西北前线“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草隶,趋急速耳。”军情紧急,容不得戍边将士们用古隶书一笔一画地写,他们就采取“减、省、连”的方法,加快了写字速度。于是,前线往来的公文、书信中出现了书写较为草率的隶书,这就是“隶草”。

隶草逐渐成熟,就解散了隶体,发展成“草书”,一步一步地接近了草书。

长期以来,人们大都以为先有了正规的楷书,然后是行书,最后才发展到草书,书法的练习也严格遵循这个顺序。然而敦煌马圈湾出土的汉简表明,早在西汉中期就有了成熟的草书。它揭示出先从隶书到草书,然后才有行书、楷书的书法演变过程,与现行的书法观念大相径庭。

草书的成熟,标志着汉字从书写工具开始变成能够高度自由地抒发情感,表现书法家自我的艺术。

书法界认为,汉魏以后,中国书法的五体——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的创造已经全部完成了,而且两千年来没有突破。五体书已经根深蒂固在中华大地,在中国人民的心灵当中定格了。

艺术的真谛在于创造。具有5000年辉煌历史的中国书法,同样面临着创新发展的历史命题。上世纪初,康有为曾经掀起过碑学革命,以打破唐代以来的帖学传统。

书法家沈曾植最早尝试借助敦煌汉简进行变法。他把简牍中行草的笔法,融入到碑体书法中,最终在行草书的变革上取得了突破,创造出一种古朴厚重而又自由奔放的行草书,令人耳目一新。

进入21世纪,书法如何发展,如何开辟新的天地,又成了摆在书法家面前的重要课题。